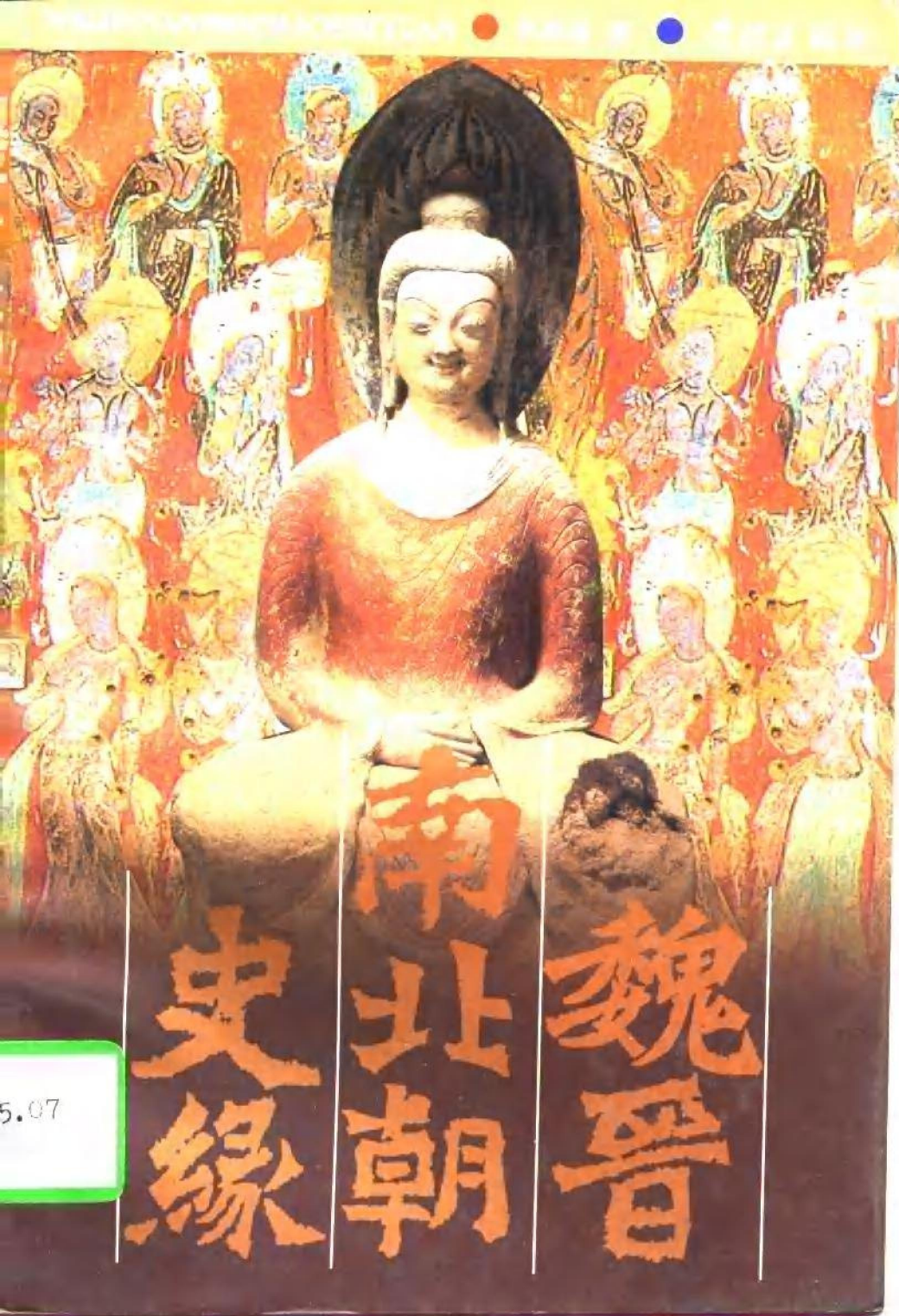




南北朝史緣

5.07

98
K235.07
8
2

BA28114

魏晉南北朝史緣

學林出版社



C

463203

责任编辑:徐智明
封面设计:沈兆荣

魏晋南北朝史缘

李培栋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钦州南路8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松江新生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字数 110,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80616-261-5/K·17 定价:8.00元

目 录

自序·····	1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认识价值·····	8
论孔融“儒变”·····	12
陶侃评传·····	20
北魏太和改制前胡汉形势论·····	45
北魏太和改制论纲·····	76
高欢族属家世辨疑·····	85
六朝国策异同论·····	95
《晋书》研究·····	108
《晋书》的文学性·····	140
《晋书》撰人续考·····	146
《〈晋书〉人名索引》求疵·····	154

札记

诸葛亮躬耕地考辨·····	158
鱼豢“发蒙”·····	163
晋初的一桩经济案件·····	166
读《南北朝史话》·····	168

自序

我与魏晋南北朝史结缘，当始于1957年春。当时，程师应镠在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正主讲《中国古代史》的魏晋南北朝史段。我任助教，随堂听课，校印资料，为学生辅导答疑。因为程师课上大量引证原始资料，有时直接把珍贵的《晋书斟注》（嘉业堂本）带进课堂，课间课后在学生中传阅，这就逼我非多读书不可。有次程师对我说到刘弘、陶侃，说此二人与清谈时流不同，可以研究；于是，我在课余就重点阅读《晋书·陶侃传》，由此深入下去，果然感性认识大增，颇感古人须眉表情皆可再现之乐，终于写成《〈晋书·陶侃传〉读后》一篇读书报告。不料，此文甫成，反右骤起，程师的课讲到初唐也就不得不终止了。

我这篇读书报告也就不再有人关心，只在建院一周年青年教师进修成果桌上摆过一下，聊以充数，之后，我便收回，敝帚自珍去了。然而，无论如何，这是我写下的第一篇魏晋史文章。两晋之交的风云际会中的历史人物形象以及由传世文献搜求资料以谋复原历史的那种感受却是再也忘却不了的了，这种感受又伴和着那个时期随程师进出课堂的助教生活一同深深刻印在我的心坎里，像一个神圣又复杂酸辛的秘密一样从此被珍藏了起来。

反右运动之后，在大跃进的激流中，我被“下放锻炼”到中学去教书了。我是随遇而安的，长期的肺结核的折磨使我对什么都比较冷漠。然而，在中学的繁忙又有趣的工作中，我真正发现了

教育工作的意义和教师的社会责任以及教师工作提供给我的那种极其可贵的认识社会、了解市井的窗口作用，我开始学习去做一名称职的教育工作者了。不料，“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竟降临了。我在劫难逃，既是“漏网右派”，又是“白专偶象”，第一轮大字报中，我的名字就上了墙头。几次抄家，我保存的全部读书笔记、卡片连同日记统统被抄走了！在隔离审查终于告一结束得能回家时，与妻子儿女幸能“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时，虽对多年心血全部荡然很觉遗憾，然而，哪里还有对那些“身外之物”再作什么计较的心情呢？

在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有一段被“四人帮”称为“黑线回潮”的时期，我在这一时期开始时，就又恢复了教师工作的资格，告别了烧窑工场，告别了“深挖洞”工程，又走上课堂讲台。这时候，老朋友也渐渐恢复联系，有天，谈宗英兄来访，方才得知张家驹老师已于几年前去世，不由大吃一惊，于是联想到往日各位老师，一时，思念之情油然而生，竟不可遏制。终于，有一天，斗胆回到母校去看望老师了。程师看到我，分外高兴，大家似乎都有恍若隔世之感。我知道他在文革中困顿至极，然而，他却毫不在意，依旧乐观，笑声仍如十多年前般爽朗，他说他们——他和魏建猷老师等正在被“废物利用”，在标点《宋史》，他又取出他在文革前受吴晗之邀为北京出版社写成的《南北朝史话》清样，告诉我这是文革抄家后幸存的“孤本”，说“你可以带去看看”。带回家来，我仔细读过，幸好家里的线装旧书因“小将”不屑一顾，并无损失，因而还可认真查对，这就使我又重新温习了一遍这段历史。这之后，又与程师就此书通过几次信，还在外滩相约一同散步，在德大西菜馆就餐时，他大谈沈从文先生的各种“奇遇”，好像他满没有什么事一般，我把书稿还给他时，真不知道这本书何时才能出版呢？

“四人帮”终于被“一举粉碎”了，“文化大革命”也终于被宣布正式结束。我也终于恢复“革命群众”的光荣身份，有资格被称作“同志”，不再是“帽子”被人“拿在手”的“对象”了。因此，为了“落实政策”，抄家物件也可以取还了。那天当我在党支部办公室走廊的麻袋中翻腾着寻我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忽然眼睛一亮，竟发现了程师当年讲课的听课笔记，接着又发现了我那篇纸张已经发黄的“读书报告”！我激动得流出眼泪。这时，我才觉得原来这些东西对我一直是那么地珍贵，原来在我内心深处实际上从来没有忘情于和这些东西相联系着的岁月，只是久久地、久久地，我不忍去想，不堪去想罢了。

不久，上海师范学院复校了，我又回到母校历史系工作，挑起教学工作的责任。教学之余，当然还是作点研究工作。程老师鼓励我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篇读书报告正式写成文章，这就是《陶侃评传》。1979年在建校廿五周年时，曾油印作为献礼在系的报告会上讲过，后来又经删节，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的1980年第三期上发表。日本学者池田温教授在他为山根幸夫主编的《中国史研究入门》一书写作的第三章“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中，曾在历史人物传记研究部分介绍若干篇文章，并说：“现仅举出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几篇”，不料，这篇《陶侃评传》竟也忝列其中。池田温先生肯定对我毫无所知，并且，我想一位外国学者恐怕是绝对想不到他所介绍的这样一篇文章竟会有这么长久和曲折的一段经历的吧。现在我把这篇文章删节的部分又基本恢复油印原貌，尤其是前言部分，因为它表达了我的一点儿心曲，且曾被当时历史系的几位学生所欣赏，我觉得没有理由继续弃置不用。

1984年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成都成立，我非常兴奋地去参加会议，这时，我正在为上海辞书出版社撰写历史辞书

条目，都是魏晋南北朝史段的，当时在重整旧业中，已对《晋书》产生了一些看法。因此，我带去参加大会的论文是《〈晋书〉研究》。这次成立大会上，老中青三代人聚集一堂，那种热烈的气氛至今犹在眼前。缪钺、周一良、熊德基诸位前辈都在大会上讲了话，闭幕式上我竟被派作会员代表发言，至今仍觉荣幸和惭愧。这次成立大会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一件大事，程师当然十分关心，只是，这时他已在病中，又在忙着行政工作，因此未能参加，我和严耀中同志回来告诉他会议的种种情况，并说曾代表他去拜访过一良先生，一良先生在大会讲话时也曾特别推荐过程师的《南北朝史话》，说：这不是一本一般的史话，值得好好阅读，书里可以说无一句话无来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程师听后高兴地笑起来了。因为，当年北京出版社为出版此书曾遇到各种阻力，甚至有迹近“诋毁”的棍棒式批判，而批判者却又偏不表明内心其实别有政治理由。

作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会员，我与这段历史的缘分可谓峰回路转，终于复得团圆了。第二次大会于1986年秋在烟台举行，这次我带去的论文大致是收入此集的《北魏太和改制前胡汉形势论》的文稿，然而题目不同，角度亦有不同。大会开得颇为热闹，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文史哲》编辑部组织一组笔谈，约我写上一篇《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认识价值》。然而，就在此时，我已身不由己地被派到学校教学管理的行政岗位上去工作了。行政工作是愈做愈多，愈做愈忙的。有次，接待台湾淡江大学和铭传管理学院的大陆访问团时，铭传管理学院的教授兼训导长林进财博士曾说：行政工作对专业研究工作有很大的“杀伤力”，当时，全场哄堂大笑地表示同情。我就在兼任行政工作的“负伤”情况下继续着我的专业研究工作，然而，若不是有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这一强大有力的组织在鼓舞着我、督促着我的话，我

的“魏晋南北朝史缘”肯定会淡化下去乃至再度消失的。这也可以说是命定有缘、缘分未尽吧。

第三次学会大会于1989年在桂林举行，我带去的论文是收入本集的《六朝国策异同论》文稿，只是题目不同，稍有增补。田余庆教授在这次大会上，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对学术研究的冲击，曾讲过一段感人肺腑的“心里话”，他说这番“心里话”是一杯“温开水”，我很为这杯“温开水”感动。会外，他对我的文章表示过关心，鼓励道：你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嘛。当时，我在会上刚刚看到他已出版的《东晋门阀政治》这本名著，还未及细读，及至后来读过，在第250—251页上发现了这样一段话：“由于中国历史具有统一的传统，凡是统治北方的势力，都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暂时现象，都不自安于南北分裂状态，都企图南进以求统一。反过来看，南方的政权，大体也是这样。”这才体会到田先生说的那句话可能具有“深意”，因为，拙文正是论述“南方的政权”并非完全如同北方，而是另有一种模样的。在这里，也体会到田先生作为一位学者的宽容和大度。只是，由于精力有限制，我一直未能将此论文扩展开来，五年之后，仅有些许余力将此文改写成现今这个样子。这是颇为愧对田先生的。

第四次大会于1992年秋在西安举行，这次有日本、韩国学者参加，已成为一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我带去的是一篇关于文化的“散论”，其中二节就是收入此集的《鱼豢“发蒙”》和《论孔融“儒变”》。一良先生在会上介绍了刚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刘俊文主编的十卷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一书，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教授提交大会的论文《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更以内藤先生为例说明了对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成果决不能忽视。韩国朴汉济教授所一贯提倡的“胡汉体制论”的理论框架也由他本人在大会上作了介绍。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由国际间的个人出访交流进展为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交流了。这应是国际文化交流发展之势所必然,是过去所无法想象的。第四次大会上,当年的青年人已步入中年,中年同志亦渐入老境,老一辈的学者则已凋谢数名。外国同行专家的挑战,国内学术研究的危机感,真成为一个令大家焦虑的问题了。凡有幸得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结缘的同志理应珍惜此缘,广结学缘,推进我国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多出成果。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开展工作的推动下,北朝史的研究工作也有组织地发展起来了。我想,这应首先归功于大同市的赵一德同志,他作为大同市经委主任,出于对北朝史的浓厚兴趣和对云岗石窟的热爱,主动出面组织全国性的北朝史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会议于1987年在大同举行,我带去的文章是《北魏太和改制论纲》。这次会议得到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大力支持,结果,新成立的北朝史学会作为集体会员参加了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并且开始出版《北朝研究》刊物。第二次学术会议很快在1988年于邯郸市举行。我带去的文章是《高欢族属家世辨疑》。这次会议得到邯郸地区党政领导的积极赞助,在参观北响堂山石窟时,居高临下亲眼目睹当年高欢率军经历的滏口这一太行山隘口,一种逼人的历史真实感袭上心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人间已经换过一千四百多个春秋了。历史这门学问真是奇妙呵。

我与魏晋南北朝史结缘几近四十年,很长期间只是或断或续,若明若暗,这是我辈所处时代机遇使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或许可以说是“缘慳”吧。我想起在我由苏州桃坞中学初中毕业时,当时的语文老师汪稚青先生曾赠诗一首云:“大道多歧慎所之,南辕北辙枉驱驰,临别赠言君须记,澡雪神明惜羽仪”。汪先生似出身皖南书香世家,特错爱于我,且颇为我获作文比赛奖而

自豪,但十分不满意于我之爱读鲁迅杂文,而大力向我推荐他极爱重的徐志摩。四十六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事情都被我忘却了,而汪先生这首临别赠诗却始终被我牢记着。何以故呢?可能因为每次人生转折时,我都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地在“南辕北辙”地“枉驱驰”,先生其有预言之术乎!? 幸好我也还爱惜自己的羽毛,未曾太过辜负少年时代的老师。“枉驱驰”或许就是我虽与魏晋南北朝史缘久而却缘慊之故吧! 值此即将摆脱行政工作负担的又一人人生转折之际,特借机将前此所写有关此缘的文字结为一集,在个人来说是完成一个心愿,也给自己生活过来的时代留一存照;值此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十周年之际,也把它作为一个对学会的菲薄的献礼以表示深情的谢意;同时也是对已于7月逝世的学会顾问程师应镠的一个纪念。

李培栋

1994年10月于上海师范大学

四十周年校庆之际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认识价值

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贵在具有认识价值。所谓认识价值，其一就是鉴往知来的作用，即以古代的社会演变过程作为参照，来深化和指导对现实的认识。这个认识价值是可以实现的，但又不是轻而易举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其前提在于历史研究的成果必须真实，并由此进一步认识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我想，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可否在这样两个问题上努力实现其认识价值：一个是分裂和统一问题，一个是宗教和神权问题。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魏晋南北朝经过的是充满急流险滩、峰回路转的独特历程。这段历史的发展，表现着各种可能性，存在着多种选择的机会。东汉大帝国崩溃以后，中国已经分裂了。及至西晋灭亡，中国北方出现了一种空前的变局，胡族第一次进入中原，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国家。当时的中国有就此走上分裂道路的可能，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国家、一种神权占据最高统治地位的国家。当时的佛教、道教领袖们确实作过这种努力；胡族、汉族的皇帝们也确曾作过此种尝试。况且，欧洲和西南亚洲不是都化为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宗教国家了吗？然而，中国最终没有走上分裂的道路，中国经过近四个世纪的混乱、更新、奋斗的痛苦过程，又重新统一起来了；中国也没有选择宗教国家的体制，尽管佛、道二教得到充分的传播和发展，中国自三代秦汉以来的基本文化传统却延续发展了下来，世俗的皇权力量仍然君临在社会之上，宗教的神权在中国仍只能依附于皇权、低于皇权而存在

和发展。是什么力量使我们中国能从四个世纪的分裂中重新统一起来？使中国多次经历分裂的考验而终能统一的那种内聚力、向心力、凝结力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使我们中国抵制了宗教力量的控制？使中国多次经历外来文化的冲击而终能吸收、融合、分解和排斥，从而维系和不断更新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的那种顽强的延续力量又是什么？隐藏在这种现象后面的基因是什么？这实在是大可深思的问题。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者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而回答这样的客观问题显然是很困难的。何兹全教授多次呼吁要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中来研究。从上面提出的问题看，要给以回答，显然就必须把中国史和世界史相互参照、比较进行研究。我认为，中国 80 年代的历史研究，应该放眼全球，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去观察外国历史，同时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来观察中国。我们要同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派，建立有世界意识的中国史研究学派。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新时代历史研究的优势之所在——我们的祖先包括乾嘉大师在内是不可能提出和实现这样的任务的。这样的努力必将有利于实现历史学的认识价值，有利于发挥历史学对现实运动进程提供咨询的作用。历史研究深入到这种程度，将不会再有人忧虑什么“史学危机”了。

然而，要深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还必须破除传统史学观念的蒙蔽。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的时期，是一个多民族斗争和融合的时期。恰恰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存在着两个传统史学观念的严重影响。第一个是大一统观念。中国人太习惯于把中国看作天然应该、天然就是统一的了，中国人也太习惯于把统一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一并肯定、一并歌颂的了。中国人从来把分裂看作一种不正常现象，把统一看作天经地义的唯一常态，并且是有经典依据的。像董仲舒所说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

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所以，如果提出在历史上存在着分裂的实际，进而分析分裂的实际中又存在着分裂下去的可能，并且，分裂的实际中也产生过分裂的思想（这种微弱的思想从来未成为过主流，也不被重视）；如果认为分裂的长过程中，中国并非一团漆黑、一切倒退，其间有竞争、有发展、有开拓、有创造、有着勃勃生气，有给中国社会注入的新鲜血液，那么，往往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异端。实际上，把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统一看作是绝对的“善”，正犹如把分裂时期看作绝对的“恶”一样，都是片面的，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之实际的。实际的情况倒毋宁说：中国历史是在统一和分裂的两种形式下交替发展起来的。当然，就现实政治生活而言，我们反对任何分裂的思想和行为，拥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但是，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毕竟有所不同。对历史上的分裂和统一作具体分析，肯定在分裂时期、在分裂条件下，中国社会仍然在进步；研究在分裂时期成长着新的统一的条件，统一最终要战胜分裂，这恰恰是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的体现，恰恰是对中国何以长期分裂而终能统一的内在根源的论证。没有这种科学精神，不能突破那种盲目而片面地歌颂封建大一统的传统观念。

第二个是汉族中心的大汉族观念。中国历史上习惯于把中国看作天下中心，又把汉族看作中国的中心。我们的历史习惯于把五胡、六夷看作破坏的因素，同时又把他们的一切进步都归因于“汉化”，似乎“汉化”就是进步的终点，而看不到他们的异质文化对于汉族是否有超越的一面，也不愿看到他们在学习汉族文化的过程中有着创新和推进的一面，更不愿承认在胡汉斗争、融合的过程中还有汉人胡化的一面。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真实并非简单的汉化，亦非简单的胡化，而是胡汉融合，共同铸造出隋唐新文化来。陈寅恪先生早就说过：“李唐一族之所以

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是陈先生忠于历史真实的论断，也是对传统的汉族中心论的一个突破。可是陈寅恪先生只是开创了这样的研究道路，决没有穷尽这样的研究工作，更多的突破和具体的研究有待于我们去进行。可惜，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还不理想，也没把这种对“汉化”观念的突破体现到大、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去，以引导人们认识民族关系的历史实际和培养正确的民族观念。中国历史上的“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观念导致中国骄傲自大，也导致入主中原的胡族最后也模仿着汉族蔑视起胡夷来。这种把中国看作唯一的礼仪之邦，把所有异族看作化外之人的传统思想，实在是中国近古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根源之一。它阻碍中国老实地承认自己的落后，也阻碍中国人虚心向一切外国先进文化学习。

此外，我们应加强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存在大家已注意到的外来宗教的影响，还存在着胡族游牧文化对汉族农业文化的严重挑战。我们不妨从两种文化撞击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时期的历史，这种撞击所引起的后果，都是很有意义的课题。这种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异质文化间的交流、融合的规律，有提供新成果的可能，是实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认识价值的又一个机会。

论孔融“儒变”

孔融在文学史上被列入他本人肯定耻于为伍的建安七子之首席^[1]，而在思想史上则总被忽略他曾起过的历史作用；他又不幸生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因此在生前身后多次遭受到特殊的毁誉荣辱。孔融其人，题有余义，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变异的一个生长点视之，犹有可论。

一、“儒”抑“非儒”

曹操罗织的孔融罪状具见于《后汉书卷一百孔融传》，全状计列孔融五罪：

1、“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

2、“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

3、“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

4、“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5、“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凡此五罪，1、2、3 为不忠，4 为不孝，5 为不敬孔圣，综合定

案为“大逆不道”，据此可见曹操原不以孔融为“儒”，倒是以其“非儒”而治罪的。

后来的反曹派只是热衷于骂曹篡汉，颂融忠贞，从来讳言上述罪状，只全盘否定为“枉状”，不去深究，而满足于起劲地强迫孔融扮演孔门圣裔的忠臣孝子。

“四人帮”则批孔颂曹，对孔融定案材料的“非儒”言论却更视若不见，相反，只因孔融反对了“大法家”曹操，且又是孔丘的二十世孙，就一个劲地把孔融打成了“反动儒生”。罪名大而且多也是够惊人的：“钻进曹操营垒”的“反动大儒”、“鼓吹分封割据”、“勾结袁绍”、“复古倒退分裂”等等^[2]。

孔融真是一个被历史耍弄歪曲了的不幸者，他的思想面目千余年来被涂来抹去，竟是真相不明了。

然而，曹操陷害孔融的两名得力助手都曾与孔融交好，他们所罗织的言论倒应该是可信的。这两人，一个是郗虑（字鸿豫），孔融自云：“融与鸿豫，州里比邻，知之最早。”^[3]另一个是路粹，孔融也在《荐祢衡表》中称赞过他：“近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擢拜台郎。”以孔融的“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又“宾客日盈其门”，“座上客常满”，对他们当无防备，而此二人既已投靠曹门，当然会着意搜集孔融的各种言论，以为投献。郗虑先已“承望风旨”，奏免了孔融的少府职，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六月，“曹操自为丞相”，八月丁未就提拔郗虑为御史大夫，五天之后，这位新任御史大夫就“构成其罪”，杀了孔融且“夷其族”；写“定案报告”的就是当了“丞相军谋祭酒”的路粹。从五条罪状看，除第一条言语俚俗，似属虚构外，其余四条倒都是合乎孔融后期的性格特点和思想风貌的，郗、路二人在孔融身边确下过一番“调查”功夫，不得谓为纯系捏造的“谣诼”。